

第五章

艰难曲折 历经考验

(1957. 1. —1978. 11.)

第一节 建国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首次严重挫折

一、共产党邀请民主党派帮助整风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进而发展和完善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成为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因而，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大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带领他们所联系的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

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①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等发言，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命题，最早见于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中，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里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②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③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第一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上公开提出了两类矛盾问题，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375

^{②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514—515

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而在毛泽东发表那个讲话之前，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也论及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关系，在总结吸取苏联、东欧等国的经验教训，并系统研究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善于处理敌我友关系和革命队伍内部关系的好经验好传统，而且把《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体现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关系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它继续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的路线和方针，坚持了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正确分析和论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个巨大的鼓舞，更加激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忱和积极性。

所以，3月5日在京开幕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气氛较为活跃，仅大会发言就连续了13天，许多委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就所接触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张治中、章伯钧、马叙伦等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发了言，提出

要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等等。《人民日报》对于委员们的意见均有整版或摘要的报导，一种“争鸣”的局面开始在报章上初步形成。

在最高国务会议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先后召开了会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三届二中全会，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召开了座谈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中国致公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九三学社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这些会议开得比较民主、活跃、热烈，委员或代表们畅所欲言，坦率批评。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召开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通过讨论，各民主党派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思想趋于一致。此外，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地方组织对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够尊重，有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以致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等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最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各自地方组织及其成员在当地政协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有关文件，联系实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会议显示，各民主党派在协助自己所联系的那部分人的自我教育方面，在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方面，都将更为积极，民主党派本身的组织也将更加活跃。总之，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调节人民内部矛盾作出更多的贡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目的在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指示》要求，着重检查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的情况等等。《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上而下，从领导干部到全体党员逐步展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于1942年开始，进行过一次延安整风运动。那一次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彻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系统地讨论和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团结了同志，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明确和加深了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原则的理解和对中国革命性质、特点、道路的理解，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为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彻底完成人民民主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次整风运动成为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一个范例。此后，在1947年冬至1948年，各解放区的党的组织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过一次整党运动；建国初期，1950年开始至1954年春，也进行过一次整党整风运动。这两次整党，也都比较好地达到了当时的目的，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水平，纯洁了组织，改进了党风，使得党更好地担负起了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任务。

1956年，中国社会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社会关系根本变化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根本任务也变化了，另一方面，党内许多人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新任务，执政党的地位，又使得党内一部分人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去处理问题，甚至产生特权思想，用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群众。有鉴于此，毛泽东

在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提出了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①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②他还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③1957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整风问题。他说：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错误也还不少。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5月1日在报上公开发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主要地位”，“要在全中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更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296，327，328

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民主党派的许多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民盟机关报《文汇报》还发表了《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社论，表示愿意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但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仍心有余悸，有些人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有些人采取“金人缄口”的态度，害怕零存整取，将来算总账。

为了更好地发动党外广大群众、爱国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第三天，毛泽东便于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分析的态度给予回答，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因此，5月份，各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发出通知或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大胆争鸣，诚恳坦率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供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参考。

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25次，每次座谈会内容都整理见报。与此同时，《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

分子提意见，并报道了发言内容。此外，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先后召开数十次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党外人士在这些会上对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工作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坦率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中间也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大部分的意见是正确的、很好的，许多意见在今天看来，不但正确，而且切中时弊，例如：

张奚若、陈叔通、许广平、龙云等人批评共产党内在成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希望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盲目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及其经验教训；刘斐、王绍鏊、邵力子、黄鼎臣、黄绍竑等人提出要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应改善党群关系；熊克武、刘斐、黄绍竑、刘文辉等人建议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王昆仑、朱蕴山、邓初民等人提出了对几次运动后遗症的处理问题。此外，一些人还要求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人事制度公开化，要在群众的监督下，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一视同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创造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环境和条件，等等。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之间对一些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高等学校党委制领导好，还是校务委员会领导，或教授治校？怎样认识和估计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资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还有无两面性？定息是不是剥削，定息应不应该20年？等等。另外，章伯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问题。对此，有的与会者提出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批评。王昆仑说，我们提意见的目的在于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现在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不是在野的反对派，国家工作有缺点，我们也有责任。只有持这样的立场观点，才能够充分参加国家事务，才

能够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和批评。何香凝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欧美式的政治。她认为这些人是右派，应该不断改造和提高自己。

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之机大肆散布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共产党及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掀起一股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进退失措”，认为中国也将发生匈牙利事件，要出来收拾残局，同共产党“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平分秋色”；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污蔑人民民主专政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产生的总根源，没有优越性，叫嚷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他们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

当时，国际上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国内人民内部矛盾有所显露，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出现了思想动摇和混乱，甚至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罢工、罢课和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专心于自己的整风，而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置之不理，无疑不利于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予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二、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

中共中央发动反右派斗争，经历了一个酝酿和发展过程。在开始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时，并没有提出反右

派斗争问题。当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出笼后，毛泽东的警觉性很高，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并且硬着头皮听，先不要反驳，让他们放。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①；允许把大量的乌烟瘴气的东西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文章提出了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指出，确是右派要给他们扣上右派的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②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隔断了全国转向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国家政治生活开始极不正常，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受到了严重损害。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相呼应。此文表明，毛泽东已经下定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决心。

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发动始于6月8日，这天，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③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424—425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426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432

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对于反右派斗争可能导致扩大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一开始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和担心。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共产党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对共产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刊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正确意见,未能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和认真研究。

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同盟”,错误地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①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②

实际上,“章罗同盟”在组织上是不存在的,民主党派各地方组织中的所谓“章罗同盟”分店更是没有根据、违背事实的。尽管,毛泽东于《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435

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在1956年7月和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代表对广泛涉及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诸如关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问题、关于共产党与非党的关系、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等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及具体建议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后，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诸多方面提出的诚恳坦率的批评和建议，虽非尽善尽美，有的意见和主张是错误的，应当批判，但大多数意见是善意的，确实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及时纠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可是，许多正确的意见却被当作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加以批判。至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1957年召开的4月工作会议，是一次正常的工作会议，会议中的活动和决议，是健康的。这次会议上，民盟中央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是民盟成员出于社会主义热忱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献计献策的成果，是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积极性的表现。这两个文件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当作反中共的纲领加以批判，是错误的。

然而，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迫于形势，各民主党派从6月下旬至8月中、下旬，先后开展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都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包括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和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了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文章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①“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456

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①要求再用几个月的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在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根据会议精神和部署草拟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毛泽东审阅修订后批发各地执行。

其后，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于9月先后进行全面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右派分子；帮助成员包括领导成员在内进行自我教育、改造政治立场；整顿和改造组织。整风不同于反右派斗争，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属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范畴。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它仍然被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特别是后期的交心活动，实际上形成政治大批判，搞人人过关，在成员思想上造成很大压力。整风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实为反右派斗争的继续。

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必要的。但运动中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错误，造成了极为不幸的后果，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这场斗争，原本也许是想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群众的联系，结果适得其反；原本也许是想扩大民主的，结果反以更大幅度地缩小民主而结束。许多中共党员干部、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绝大部分“右派分子”被撤职或降职、开除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55万余“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长期遭受打击和委曲，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和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入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461

更为严重的是，反右派斗争中断了我国刚刚开始的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法律化的进程。毛泽东估计：反右派“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①进行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虽然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②周恩来在1957年6月一次讲话中的提法更为积极，他说：“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时要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带有本质的意义”。^③可惜，这种政治局面未能长久维持。反右派斗争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一些有历史经验的领导成员离开了各级领导岗位，损害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形象，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从此，1956年下半年出现的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局面顿时消失。

反右派斗争，使得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平等的地位消失了。这时，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并且已经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又被简单地宣称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在1956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这就为后来中共八届三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461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456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207

全会改变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状况、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左”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歪曲的事实依据和错误论点。使得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一再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运动。严重干扰和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二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在曲折中发展

一、共产党改善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内于反右派斗争中滋生起来的“左”的思潮不但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继续有所发展。

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同时，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各民主党派要继续整风，要整得适合人民的要求。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依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继续领导和推动党外人士开展整风运动。2月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人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要求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实现由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改造。3月4日和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发出二个“通知”，督促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加速改造”。在此情形下，天津的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用大字报的形式，提出了“向党交心”的口号。3月16日，北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门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

我改造公约”，表示要“把心交出来”。此后，其他地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响应。4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这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向党交心”的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影响不佳，后果严重，不少地方在交心运动中又把一些人划成右派分子。正因如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中不同程度的产生了“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三缄其口为宜的想法。以往那种多少还存在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做共产党的诤友、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监督中国共产党的局面消失了。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也是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确属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全国人民面临的迅速发展经济推进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迫切的、主要的任务。然而，完成这个任务，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科学的务实精神，进行细致的长期的规划、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可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而在全国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科学分析，认定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这种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论断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而

且，一方面要求把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上来，一方面又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态，严重干扰了全国人民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这个主要工作和任务。不仅有损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民主化进程，并且使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得不到根本的纠正，反而延续了更长时间。

在上述“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6月，迅速草拟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两个纲要。其中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不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1958年冬季，民革（“四大”）、民盟（“三大”）、农工（“七大”）等民主党派的大会，受“左”的思潮影响，迫于当时的形势，在承认自己进步的同时，又都违心的重新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性质政党的帽子。由于这些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和修改的章程，明显地反映出“左”的倾向，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其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即使如此，各民主党派在努力继续推进自我改造运动之外，也组织其成员学习“总路线”、参加全民大办钢铁等“大跃进”运动和支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尽力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继续合作。

为了改善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以便团结更多的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共中央领导在1958年7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上批评了当时对待民主党派的某些“左”的错误。指示，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总是绷得那么紧，对民主党派成员不能总是斗争，要把以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民主党派的整风应该告一段落，团结他们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中去，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这次会议，是反右派斗争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整风运动基本结束的标志。它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下一步统战工作要转移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上来，着重引导和推动各民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转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同时仍然要求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显而易见，这个方针只是斗争策略的调整，还不是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但毕竟缓解了一年多紧张的阶级关系，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在当时形势下是有积极作用和意义的。

从1957年底到195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采取许多措施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的同时，继续贯彻缓和阶级关系的方针，强调要把与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松地下来，着重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进而在中共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结果使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也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上则让“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反右倾”运动尽管只在共产党内进行，可影响所及，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紧张和不安。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和比较稳妥的方针。1959年8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提出要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予以宽大处理。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座谈时指出，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也不是1952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宣布在中国共产党外人士中现在不搞运动；提出分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适合当时形势发展的要求的，改善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合作。

二、和衷共济，共度三年困难时期

从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之全国各地连续旱涝等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赶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或危机，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日益发展扩大，论争日趋激烈和公开；国际反动势力也趁机一再掀起反华叫嚣和活动。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衷共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甘共苦，为克服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卓有成效，在国际上坚决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打退了国际反华势力的进攻。

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一段时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正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影响，加之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等“左”的错误做法的连续不断的冲击，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界、工商界的大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因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国内形势和“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许多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严重的经济困难，供应紧张，生活贫困，未免产生了动摇、彷徨和不安情绪，甚至怨气；对国际形势及中共与苏共的大论战有很多疑虑和担忧。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960年下半年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同时，强调发扬人民民主，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贯彻政策，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改善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史上又逐步出现了一种新局面：面对严重的困

难，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尽管生活困苦，但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为克服困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的积极性。

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首先体现在采用“神仙会”方式，大搞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神仙会”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党内而言”。^①“神仙会”者，即是“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都能像神仙聚会一样，轻松自然地漫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②1959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庐山会议开始即采取了神仙会的方式。1959年底到1960年2月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运用了神仙会的形式，有2000多民建会员和工商联成员参加。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大会采取了“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方针，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和风细雨，细致说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相互帮助，提高认识。会议行将结束时，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见了全体代表，并同两会的领导人举行了座谈，重申了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工作和生活包到底的根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诚心诚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合作，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次大会开得生动活泼，与会代表心情舒畅。

“神仙会”不仅在当时取得了好的效果，为人们所称道，而且为其他民主党派成功的运用。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和致公等党派分别召开中央会议。参加这些党派会议的代表共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各民主党派的这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859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4，824

些会议同样采用了神仙会的方式。由于这些会议举行之时，国内的经济困难还在发展，国际上中共同苏共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更加尖锐、激烈。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多数人忧心忡忡。所以，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应邀到会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使代表们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稳定了情绪。报告中，周恩来总理针对各民主党派感到“后继无人”的问题，又提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共产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党内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围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这就是民主党派的作用。各民主党派会议结束之时，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称赞了神仙会。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的全国性会议表明，神仙会是贯彻和风细雨、深入进行思想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推进自我改造的好方法。会议中在“三不”条件下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比较自然，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效果良好。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神仙会的方式推广到全国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进一步缓和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知识界的关系，增强了团结，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在国内外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经受了考验，为保持全国局势稳定和较快地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条件——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其次，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全国人民一起克服困难，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下，努力检查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改善合作共事的关系。

1960年各民主党派中央的神仙会上，批评“大跃进”以来，一些地方和单位对统战政策进行擅自修改、任意违反，或搁置一旁，

使得其贯彻执行受到严重干扰。许多机关、学校、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排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信任他们，不尊重他们的职权，不给必要的工作条件，甚至有任意批斗的现象，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因此，认真检查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改善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对于稳定经济这个中心工作，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在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顺利度过困难时期是必要的。

1961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做了大量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凡违反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盲目排挤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错误，一旦发现，立即会同各级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三年困难时期中，为了改善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还采取了许多措施：①从1959年国庆开始，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分批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尽管未能从根本上为“右派分子”甄别平反或改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此举对于团结工商界、知识界，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事，调动他们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情，仍有积极意义。②在副食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给予民主党派高级干部、著名工商界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以特殊照顾和供应，产生了良好的影响。③对1958年以来，在“整风交心”、“拔白旗”、“反右倾”等历次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斗争了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甄别平反。这些措施调动了在社会上有广泛联系和影响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性，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起了稳定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

第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稳定经济的措施积极配合。如在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等问题上，一些工商业老、党外人士虽不乐意，但还是在行动上服从，照顾了大局。1960年，各民主党派号召其成员为超额完成国家经济计划而努力。

第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统一祖国的事业上密切合作。1962年元旦，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发表广播讲话，宣传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面貌，表示对台湾国民党、政、军、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旧友的怀念之情。

第五，1962年9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窜犯大陆华东地区领空的美蒋U-2型高空侦察机，与中共一起谴责美国的侵华罪行。

1962年2月至4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技和文艺工作会议、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和估量了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①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技和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特别强调，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近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八年、十年、十二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恩来总理还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426

“我们应该继续加强同他们的团结和合作”。^①而且，“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要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②对于这个任务，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无疑负有重大责任，但“各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应该说不是轻了，而是更重要了”。^③过去的缺点和错误，责任主要在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教训。“今后要把事情搞得更好，大家要共同负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要负起监督的责任”。^④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为指导，研究统战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会议对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爱国人士，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国内外各种风浪考验，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工作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会议确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第一，在精兵简政、压缩城市入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第二，做好甄别平反工作。第三，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

①②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428、431—432、438

④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438

派分子”的安置工作。

会议期间，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的书面意见中指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起了根本性变化，实际上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发扬民主，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和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63年，度过了难关，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三、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波动

从1959年到1965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采取了许多缓和阶级关系的方针、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但由于中共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未彻底清理，中共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未能达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的那种密切程度，不时还有所波动。

反右派斗争虽然在1958年中期基本结束，但斗争仍未完结。1959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民主人士马寅初先生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继续呼吁应当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为《新人口论》受到的批判鸣不平，表示要坚持真理、科学，“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此，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终于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界、工商界人们的思

想情绪稳定后不久，受“左”的思想干扰，1960年底和1961年初，又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估计，认为他们的政治思想出现了所谓的“大反复”，造成他们思想情绪的再次紧张和波动。自此以后的几年中，每年都要进行多次不同形式的运动，检查所谓的思想“大反复”。

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逐步得到克服，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毛泽东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①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错误地批判所谓的“单干风”和“翻案风”的同时，有人批评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处理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问题上，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等等。所以，有1962年和1964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展的，对过去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认识和处理国内阶级关系、统战工作、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法错误地加以批判。这对刚刚有所好转的国家政治生活以严重干扰，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再次受到挫折。

特别是1963年3月以后，城市“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农村“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运动先后展开。国际上，中苏争端日益激烈，反华势力日益嚣张。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加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影响，民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20

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界、工商界又被要求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政治运动上来,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和组织其成员参加或参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各民主党派工作中的“左”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日益紧张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引起了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界、工商界人们的惊慌和不安。而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下,要求其成员放弃“求安”、“忘我”的思想,痛下决心,听共产党的话,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重新接受教育,力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有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指示(简称《二十三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5—8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两部电影的文章。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些在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界、工商界的人们中引起了种种猜测和惊慌。总之,中国共产党“左”的错误理论延续和发展到“文革”时期,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浩劫与考验

一、“文革”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被严重摧残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我国发生了一场为时十年之

久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这场大动乱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和破坏，其成员横遭摧残、被迫停止活动，而中共本身及刘少奇、邓小平等许多领导人同样受到打击、迫害、摧残，当然就谈不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关系史上的这段空白，可算是对历史上那场空前浩劫的无字记录吧！但是，简单地记录一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被严重摧残的这段历史，吸取沉痛的教训，对于今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无疑是有裨益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对中国共产党内、国内形势和文化思想界的状况作了完全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把大批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当作革命斗争对象，要求把“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等，作为这次运动的重点。并规定在运动中“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6月1日，被陈伯达改组后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由此，全国逐步掀起了打倒“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

同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红卫兵就上街，以“除四害”为名，到处展开打、砸、抢。这种自杀式行动越来越蔓延，越演越疯狂，社会上人心极度震动，社会秩序和治安无法维持，宪法和一切法律都被践踏和抛到一旁。到处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寝食不安。批斗揪人之事，日夜不停，“勒令”、“查封”之风，深入社会所有角落。在这场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各级地方组织被当作“牛鬼蛇神”的老窝、“反动资本家”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巢穴，一再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各民主党派的许多领导人和一般成员的人身受到围攻、批斗、凌辱和殴打。据某些材料统计（民主党派编写党派史的提纲和统计数据），仅在京的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100多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其中民革有31人，民盟有36人，民进有8人，农工党有8人，九三学社有15人，全国工商联和民建有13人。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先后被封闭，机构地点和房产被占领，干部下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界、工商界许多高级领导人或成员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受打击、挨批斗，以至抄家游街，下放劳动，还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从此，各民主党派实际上停止了一切活动。其人员先后下放到各地劳动。

“文革”初期，打、砸、抄这类现象的发生和在短时间内愈演愈烈，原因是复杂的。简要说来，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改变整个社会面貌。毛泽东赞誉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为“革命事件”，亦即肯定了乱打乱斗，其消极影响极大。《十六条》载明：“毛主席经常告诉我

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其实毛泽东只是在国民革命时期著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过这段话，并没有经常告诉我们。）当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毛主席语录歌十分流行。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篇社论赞扬了乱揪乱斗，抄家和扣地出门的做法。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漾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

第二，毛泽东是不赞成打人的，也不赞成取消民主党派，但是囿于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便于下令制止他所不赞成的一些行动。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第三，康生、谢富治的怂恿和支持。康生8月19日同中央党校武葆华等人谈话时说：“乱了就可以治嘛”。8月，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第四，说到底，肯定和号召如此这般的破“四旧”，肯定和号召把“老寄生虫”揪出来，肯定和号召把“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富”“拿出来”，就等于肯定和号召打、砸、抄。内容决定形式、方式。

二、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经受住了 “文革”的严重考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比较迅速地恢复了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继续合作共事，是因为十年动乱中维持了同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维持又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陶铸、陈毅等，特别是周恩来对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保护分不开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尽管后来运动发展的实际状况同这种设想相去甚远。但是，毛泽东并不希望局势动乱到失去控制的地步（或许他也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并非符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故“文革”初始，红卫兵开始“造反”，毛泽东写信支持，同时也告诫他们，要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民主党派还是要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

央一次汇报会上又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他还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着反康、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还要开纪念会。当民盟湖南省负责人周世钊的家被抄后，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当说的说，可管则管，不必负气。1975年10月，毛泽东还指示要早一点召开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他批发了关于处理在“文革”中查抄的爱国人士财物的文件，规定被查抄的财物应一律退还给本人。

然而，在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阳奉阴违，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肆意践踏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了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对此，周恩来等在他们的战友、党和国家其他许多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为尽可能地减少“文革”这场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苦撑危局所作的努力，有许多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保护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7月30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当着江青的面说：“要搞真正的民主空气，有的地方说辩你一家伙，就是斗你一家伙，搞‘喷气式’，这个不好”。8月30日，北京外语学院传达了陈毅的讲话，也批评了北京盛行的打抄风气。8月3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与林彪在同一场合的讲话大相径庭。周恩来着重讲的是：“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大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创造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气”。同年秋，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说：统战工作还要搞下去。你们不要动摇，不要撒手。在那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的年代，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民主党派成

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遭遇更可想而知了。故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关心、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同时，也关心和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例一：1966年8月29日夜，某校红卫兵粗暴地抄查了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档案馆馆长章士钊先生的住宅。30日晨，86岁高龄的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毛泽东，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①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拟定了如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政协副主席——引者注）

(4) 国副（国务院副总理——引者注）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引者注）

（李宗仁）”^②

周恩来还指示首都301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先生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当周恩来听说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在兰州被冲击后，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

^① 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4期。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450—451

北京予以保护。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你们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的，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搜查、抄家就是打倒了。你们建议定息取消，很好，这应当由中央、主席提出，人大通过。”“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同月，周恩来对哈尔滨来京的学生说：公安部抓人还要中央常委点头，你们这样做，中央专政机构还要不要？如果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抓人，这还了得！这是个原则问题。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代表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没收由公安局统一没收。又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哟！

例二，为了保护好宋庆龄，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突出地讲了“应当尊重宋庆龄”。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绝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

阻”。^①可见，周恩来从政治上、历史上全面肯定了宋庆龄，措辞委婉而态度坚定地制止了少数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有效地保护了宋庆龄。

例三，张治中先生是“文革”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重点保护的人士之一，周恩来在知道红卫兵冲击张宅之后，就在第二天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说：“你们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的故事吗？他是我们的朋友。重庆谈判时，他坐专机到延安迎接毛主席，谈判完了，他又护送毛主席回延安，他那里你们就可以不去罗！”此时正在周总理旁边的江青也不得不假惺惺地说：“我们对张治中不为已甚，三到延安嘛！”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毛泽东也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是民主党派人士。要和红卫兵说清楚，在共产党以前就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可周恩来还是觉得不放心，第二天就派人把张治中先生接到另一个地方保护起来。1966年国庆节，张治中先生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关心地笑问张治中先生：“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答：“去了。”毛说：“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干什么！”

例四，1966年10月1日，“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周恩来特意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等；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部长和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参加国庆观礼，对他们采取了一次在国庆观礼台上露面的保护性措施。国庆盛典开始前，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东休息厅举行座谈，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认真解释“文革”的方针政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451

策，还针对个别人的情况，提出了保护的办**法**。1969年5月4日，周恩来给当时国务院直属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转人大、政协军代表的信中说：“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云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周恩来还指出：“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①“文革”期间，周恩来和聂荣臻还曾指示北京卫成区的领导同志，给科学家们增加警卫力量。此外，民主党派中的许多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也为保护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作出了自己的积极努力。

上述的这一切都是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之所以经受住了“文革”的严峻考验，还因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确立起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忠诚。

对于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就连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主要领导人都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更是毫无思想准备。在那人鬼不分的年代，钻营投机者有之，趋炎附势之辈有之，追名逐利之徒有之。全面动乱，劫难当头，谁也不知道“文革”将怎样发展，结局如何？身受折磨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难免心情沮丧，惊慌失措，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坚贞不屈，没有动摇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早在1965年底至1966年初批判《海瑞罢官》，点燃“文革”大火之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为达到其反革命目的，接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454

二连三地炮制诬陷《海瑞罢官》作者吴晗的文章，一时间，全国学术界被搞得一派乌烟瘴气，迫于形势，吴晗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屈服，在自我批评中除一些违心承认错误的语句外，大量是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肯定自己20多年来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站稳了阶级立场。其后，虽然批判吴晗的声势日烈，上纲日猛，但吴晗仍坚定地表示：相信群众相信党，事实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吴晗被批斗期间，他还对女儿说：只要我不死，就要同姚文元斗争到底。他还尽量抽时间阅读被抄家剩下的马列著作，尽可能在残剩的史籍中搜集有用的史料，准备与姚文元进行斗争。吴晗被捕入狱后，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但这位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深受人们敬重的民主战士，至死都保持刚正不折的气节，实事求是，决不苟且偷生。吴晗的遭遇，引起全国学术界的愤慨，仅上海《文汇报》就收到3000多封信稿，反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许多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也都勇敢地站出来论争。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历史专家翁独健仗义执言：姚文元指责《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指出：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这些铮铮直言，击中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要害，他们恨之入骨，制造一系列冤案，残酷地迫害翁独健、翦伯赞等人，致使翦伯赞饮恨而逝，但他至死仍然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不向江青一伙低头。

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受到冲击、迫害，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始终不变。面对动乱的局面，他们一方面

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表示担忧，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多次向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进献忠言，力图改变混乱的状况。例如：原湖南省副省长、民盟中央委员、湖南省主任委员、毛泽东的师范同学周世钊，于1967年进京面见毛泽东，直陈林彪、江青等人恣意造反派胡作非为的言行，谏劝毛泽东采取措施，进行制止。1968年国庆节，张治中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又见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超过5%了吧？”言下之意：您不是说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吗？1972年8月，周世钊先生又坦率陈书毛泽东，信中借批判林彪、陈伯达，道出了林彪等人的反革命路线和行为仍在被人继续着。信中说：“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背着主席，排挤异己，扩大黑帮。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外老干部被他们假借各种名义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至今不能平反；“林陈为了破坏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一些年龄稍大，家庭出身稍差，而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都较好，文化水平都较高的人，常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令其辞职退休，用一切办法排遣出去。”信中还直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些弊端：“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①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敢像周世钊、张治中先生如此大胆直言不讳的人是不多的，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胆略的。这里不仅表现出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赤诚之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也说明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动乱年代，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知识

^① 相遇费相知第2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11、12

界的人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使“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坚持各自的工作岗位，为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例如：不少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在被批斗或被抄家之后，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立即重返岗位，继续坚持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有的白天挨批斗，夜里坚持干，在十年动乱中写出了科学著作。有的敢于冲破林彪、“四人帮”的“围剿”，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科学观点，为文教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有的则在技术革命、增产节约等方面做出了成绩。有的人被非法关押，虽然受尽折磨，却保持了可贵的政治气节。民革中央领导人王昆仑、屈武、朱学范身陷囹圄，始终不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民革中央委员廖运泽，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林彪、叶群多次派人胁迫他提供伪证，捏造林彪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甚至以手枪当血威胁，都被严辞拒绝。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车向忱，在被非法拘禁的情况下，于日记中写下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孙子臧足而写《兵法》，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话语，借以激励自己处逆境而不忘党的事业，“准备再干上20年，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为共产主义献终身”。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一次又一次地给周恩来写信报告情况。直到1971年1月8日被迫害而死。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在1968年国庆节前夕没有接到上天安门的邀请，预感到自己有被陷害的可能，就把爱人、子女找到身边，严肃地说：“你们要有精神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们要记住这样三条：第一，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你们可以放心；第二，我这一生最敬佩两个人，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仰我是不会变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三，我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死在哪里都行，但决不自杀。”果然，10月8日凌晨，高崇民被非法逮捕入狱，横遭折磨，于1971年7月29日在狱中含冤逝世。

在十年内乱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维持了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系，奠定了“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恢复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的一定基础和条件。

第四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恢复与经验教训

一、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恢复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我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拨乱反正中，中共中央逐步恢复了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的统战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民主党派相继迅速恢复了组织活动，从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新的合作共事。

1977年2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饭店举行春节联欢会，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应邀出席，他们同中共中央领导人欢聚一堂，亲切交谈，精神振奋，决心加倍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加强联系，协商有关恢复活动等事宜。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建议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及省会城市的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始恢复活动，根据有些党派没有主要负责人的情况，建议先组织临时领导班子开始工作，然后推动他们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整顿组织，健全领导机构。10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会办事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由统战

部负责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意见，鼓励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工作。于是，各民主党派分别宣布正式恢复活动。

同年12月27日，全国政协四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四人帮’为着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竭力破坏和妄图取消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肆意践踏党的统战政策，破坏党的统战工作，极力摧残和打击一切积极因素”。^①重新肯定了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重要作用。这个统一战线，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胜利地进行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②因而，叶剑英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强调加强中共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各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学习组的联组会，并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积极发动和组织成员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揭批“四人帮”的文件，举行了各种类型的学习批判会。他们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阴谋，揭发他们残酷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同时，着重揭批“四人帮”破坏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迫害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特别是批判“四人帮”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诬蔑为“反动党派”、“牛鬼蛇神的黑窝”、“国民党

^{①②} 叶剑英同志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7日。

残渣余孽”，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反动的学术权威”、“臭老九”等反动谬论，批判他们否定建国以来教育科技战线伟大成就的“两个估计”以及他们残酷迫害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知识分子的反动罪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深入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的爪牙炮制的所谓《处理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揭穿他们妄图割断归侨、侨眷和国外亲友的联系，破坏党和政府侨务政策的贯彻执行的阴谋，揭批他们据以迫害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归侨、侨眷的罪行。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有代表参加。同时，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月24日至3月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距1964年12月召开的四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长达13年之久，这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许多老同志、老朋友，劫后余生，互庆重逢，怒斥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他们的迫害，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闭幕词中指出：“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朋友们、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前进，共同为我们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这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方法。建国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并列为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作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光荣传统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在长达十年间，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未能参与协商国家重大事务，更没有能同中国共

产党相互提意见，作批评，进行互相监督。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立即着手恢复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光荣传统。197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这无疑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基本方针的再次肯定；1977年的元旦社论和同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讲话，都提出要发展“革命统一战线”；1977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召开五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和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也都提出了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的有关人士问题，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12月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明确指出：民主协商，是毛泽东、周恩来为我们统一战线树立的优良传统，这些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应当把它恢复和发扬起来。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发扬民主作风，虚心听取党外的批评和意见，要认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978年初，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夕，部分在京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协委员，分5个小组座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第一次大型的议政活动，与会人士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为时4天的座谈讨论中，对宪法修改草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合理的修改意见。接着，参加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同其他代表一起列席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一年内，全国政协在京的常委还先后3次列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听取外事访问报告和关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报告；2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座谈会和报告会，听取冶金部关于冶金工业方面的情况介绍和关于邓小平前往日本出席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批准书仪式并进行友好访问的情况报告。

1978年，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在京政协委员多次参加了赴四川、上海、福建和天津等地的参观团，对全国及各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发展、教育工作、民主与法制、民族与宗教工作、对台宣传工作、外事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地参观调查、座谈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和建议，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加速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特别是1978年5月24日和6月8日，在全国政协文化组举行的2次全组会议上，杜任之委员和余春焕委员，分别提出了为吴晗昭雪，为《海瑞罢官》、《二月提纲》平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为“四五”运动等重大政治冤案的平反及“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起了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影响，“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否定，“左”的东西还禁锢着人们的手脚，统一战线方面的拨乱反正也遇到严重的障碍。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如对建国17年来统战工作的估计，新时期民主党派性质等问题还迟迟得不到澄清。虽然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在这个时期得到恢复和有了个良好的开端，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处于一种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经验教训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有发展、有挫折，甚至中断了一个时期又恢复发展起来，即处于一种曲折前进的历程中。这里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正确处理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不充分和坚定。

1956年，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进而更好的合作，成为我们完成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认识和处理与其他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各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而要求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具体道路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是一党执政或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中国民主党派原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但它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爱国的、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政党。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赞成和拥护共同纲领。1953年，他们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1956年，随着我国大陆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已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各民主党派于1956年先后召开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修改了党纲党章，明确提出了“为

将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总方针，走上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民主党派的性质随着其社会阶级基础和政治路线的转变而有所变化和发展。各民主党派已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过渡。即由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所以，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肯定了民主党派性质的这种变化，宣布：“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①

民主党派性质的上述变化表明，在社会主义阶段，即使在阶级对抗消灭之后，仍然存在着非单一性的社会结构。各个阶层和社会集团除根本利益的共同性和一致性之外，还有他们特殊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目标，不能忽视各个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要求，而是要通过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把这些要求反映在共产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因此，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继续联系和代表这部分劳动者，推动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进一步实行自我教育。这是我国各民主党派能够同共产党长期共存的客观依据。周恩来在阐明长期共存这一方针时曾说，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他指出：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②毛泽东也说：“共产党和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50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350

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①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学说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党共存的可能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难免在工作中出现缺点和错误。对此，中国共产党除依靠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外，也非常需要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因为它们今天和将来都联系和代表一定的社会基础，“能对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②新中国成立以来事实证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它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与批评，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工作很有好处。体现出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努力研究问题、积极提出批评建议的认真态度，表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同时，也表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有利于坚持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将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彼此间在政治上有互相协商、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应该相互严格地尊重对方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力加以干涉。诚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同时也是平等的友党关系。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应当经过行之有效的宣传工作和政治协商方式，使民主党派自愿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279

②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

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而确定自己的政治行动，而决不意味着共产党可以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附属团体或组织。共产党一定要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允许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平等地位，尊重它们独立地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和开展活动的权利。当然，也不应该把对各民主党派独立平等地位的尊重，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对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协商。事实证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解释，通过政治协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至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依据这些方针政策如何进行工作，那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做到既不妨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性。为了真正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积极态度，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保持经常联系，同它们建立诚恳的、友谊的、互相合作的关系。

195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带领他们所联系的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可惜，从1957年夏季开始，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隔断了全国转向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受到了严重损害。其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虽有所调整、发展，但受“左”的思想影响，这种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处于曲折之中。到“文化大革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已无从谈起。

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形式，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也受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和历史根源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消灭阶级，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途径，使人类社会摆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逐步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制度毕竟得到建立，国内的社会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必须自觉改革或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改革、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

三大改造完成后，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已发生变化，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各民主党派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政府工作发议论，作批评，提建议，实为一种政治积极性的表现。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这种进步性和积极性估计不足。尽管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二篇文章。可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整风之前及整风期间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工作提出大量意见以至尖锐批评时，当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突出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仍停留在过去，产生了错觉，把人民内部的各种批评和意见误认为敌我矛盾，并且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活动估计得过于严重，这就难以避免地导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诚然，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提出“非斯大林化”，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严重思想混乱。同年10月、11月，又先后出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借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16

一再掀起世界范围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恶浪。这股国际恶浪也影响到中国，国内出现一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少数人罢工、罢课、游行等闹事事件。这种国内外形势，引起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怀有深远历史感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极大警觉。然而，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并非“惊涛骇浪”、“十级台风”、“黑云压城”。国内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只是极少数。对此，毛泽东直到1957年春，对国内基本形势的估计还比较冷静、客观，认为：中国只是发生了一些小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没有为此所动，仍按既定计划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不过，毛泽东在波匈事件后，一直担心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故当整风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中国共产党进攻时，毛泽东就改变了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澄清大是大非，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是必要的。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完全可以制止事态的蔓延发展。把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就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从历史根源看，中共及其领导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并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革命战争环境之中。熟悉农业、手工业小生产，不熟悉现代化大生产；熟悉阶级斗争，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治斗争的策略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军事战争的部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夺取政权后，却缺乏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运用民主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设国家的知识和经验。当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问题时，习惯于过去的思维方式，沿用过去对敌斗争的一套方法，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这

就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失误。反右派斗争之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文革”的发生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开始骄傲和不谨慎了。

历史上，毛泽东是既有革命胆略，又十分谨慎的。他曾告诫全党，党在历史上的四次“左”右倾错误，都与骄傲有关。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他又提醒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甚至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他还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但是，在连续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党和毛泽东在国内外获得了崇高的威望，逐渐习惯于听歌功颂德的赞扬，很少听到批评意见。

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应当更加谦虚谨慎，发扬民主，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群众一道奋斗。但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听不得批评意见，毛泽东夸大了个人主观的作用，发展了个人专断作风，违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受到了损害，助长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走向狂热地步，便会促使一些活动家和思想家不是独立自主地去探求真理，而是设法同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保持一致，从而把应该懂得并且应该坚持的客观真理忽视了。……许多人缺乏勇气在毛泽东的巨大威望面前坚持自己的见解，造成了许多人的迷惑不解和犹豫不决，一个人的威望凌驾于其他人的意志和理智之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6

上。……毛泽东晚年大概自己也痛苦地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任何努力也未能防止10年大动乱这场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空前可怕的大浩劫、大灾难。

第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表明，它与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也有很大关系。

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有相当多的人受到冲击、批判和委屈，这里也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自身的责任。把每场政治斗争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认识并无二致。各种运动中形成的政治大批判，搞人人过关，给人们思想上造成巨大压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同样进行过。为什么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没有完全抵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为什么民主党派的许多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没能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为什么对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出来仗义直言者甚少？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国共产党“左”的思想所造成的形势所迫这个主要因素之外，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自身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故：

一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同样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认识不清，同样过于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故对各种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知所措，甚至盲从。

二是历史原因。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确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于是，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敬佩，笃信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主张和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听到较多的不同意见，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及

各种错误政治运动不能迅速、有效制止的因素之一。

历史本来在 1957 年曾给过我们一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关系的时机，我们却未能把握住。反而给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随后 20 多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关系在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影响下处于波动状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被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才有了转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不如其它各时期那么有声有色、特点突出。但仍有某些值得书及的地方：一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认同与实施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二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遭受严重挫折；三是“文革”时期，尽管已谈不上合作共事，可毕竟维持了联系，否则就无法想象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关系的迅速恢复与发展。